

1960 至 1980 年代八重山鳳罐產業的「台灣女工」： 再現、敘事、反身性*

邱淑雯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掌握 1960 至 1980 年代八重山群島鳳罐產業「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探討再現、敘事、反身性三者之間的關連。這裡的「多元」意指兩方面，一是跳脫當地媒體再現底下的她們，二是強調研究者的我過往和書寫當時的生命態度，反映到研究對象的「鳳罐女工」身上，也表現到問題意識與書寫風格上。

研究發現，《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下的台灣女工是「替代性的勞動者」、「寄生蟲的高帶原者」，但透過當地台灣移民、沖繩人以及女工本人的訪談敘事，筆者拼湊出台灣女工在島上的其他身影，她們是「絕處逢生的移民」、「勤奮打拼的勞工」、「開拓格局的異鄉客」、也是「被投射的認同對象」，這些身影的浮現，讓人跳脫只從當地媒體的再現去捕捉她們。

關鍵字：八重山群島、鳳罐產業、台灣女工、八重山每日新聞、反身性

* 本文為國科會 NSC 98-2410-H-343-022-MY2 研究專案部份成果。

一、問題意識

八重山 (Yaeyama)，對絕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極其陌生的一個地名。它不是一座山、也不是八座山，乃地處日本沖繩縣西南方海域一個島嶼群的名稱，主要是指石垣島、竹富島、小浜島、黑島、新城島、西表島、鳩間島、波照間島、由布島、與那國島等有人島，以及周邊的無人島，可說是距離台灣最近的日本 (圖 1)。從 1895 年日本殖民台灣開始，八重山和台灣兩地的人口往來就很頻繁，以「女性移動者」的遷徙來看，1930 年代八重山的年輕單身女性前往台北的上流日本家庭幫傭，是女性階級向上流動的一種選擇與象徵，而且，當時的台北被想像成是第二個東京，這些跨海移動的女傭們，對於台北都會大多投以高度的好奇與期待 (金戶幸子 2007、2008、2010；水田憲志 2003；又吉盛清 1990)。另一方面，台灣女性往八重山移動的現象也曾存在，無論已婚未婚或是年輕年長，從 1960 至 1980 年代初期，不少台灣的農村女性以隻身、結伴或依親等方式，到八重山的鳳梨工廠、甘蔗園、製糖廠等場所工作，這些女工多屬季節性的短期移工，她們在當地的工作生活常被圈限在廠區、蔗園或宿舍等空間，多數人在勞務契約結束後選擇 (或必須) 返台。

本文旨在掌握 1960 至 1980 年代八重山群島鳳梨產業「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因此，有必要先回顧相關的先行研究，並定位本文的位置及特色。

目前為止，直接而明白地描繪 1960-1980 年代八重山群島鳳梨產業「台灣女工」之日文文獻是，石垣島出身的台灣移民第二代國永美智子 (2011) 的碩士論文。¹該文探究二次戰後八重山鳳梨產業的發展與台灣女工的關連，研究聚焦的是，女工在當地的人際關係、具體生活及勞動實況，訪談對象包括台灣女工本人、殖民時期來過台灣工作或躲空襲的八重山人、鳳梨工廠的八重山當地女工、鳳梨工廠內管理台灣女工的當地人、生於殖民時代後來移居八重山的第一代及第二代台灣移民等，該

¹ 1997 年日本芥川文學獎得主目取真俊 (2003) 的小說〈魚群記〉清楚描寫當時的台灣女工，時空場景是 1972 年前夕、即將回歸日本的沖繩本島 (而非八重山群島) 北部偏鄉的鳳梨工廠。關於〈魚群記〉的相關研究論述，可參考邱琬雯 (2011b)。

文藉由不同報導人的多重視角及豐富的口述內容，試圖還原鳳罐女工在島上的形貌，可說是運用人類學全貌觀（holism）在 1960-1980 年代八重山群島的台灣女工這個時空背景的嶄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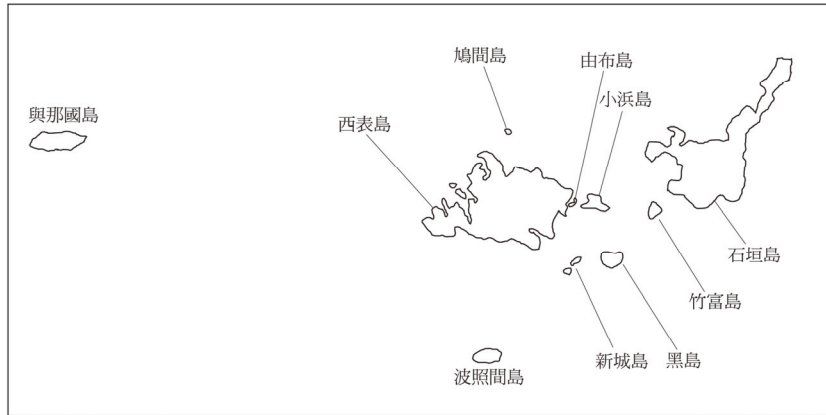


圖 1、八重山群島

必須一提的是，本文和國永（2011）的研究資料有一小部分重疊，出現了幾位相同的受訪者，但即便如此，本文仍有其獨特的視角。簡言之，本文和國永不同的是，不僅僅平鋪直述女工在八重山當地的人際關係、具體生活及勞動實況，本文的目的在於，從這些資料當中突顯女工的不同面貌，以及坦承突顯的背後，其實和筆者的生命態度息息相關，誠實交待了研究者的我過往和書寫當時的生命態度，研究者及研究對象雙方其實是相互影響、難以切割的，研究者的生命態度投射到研究對象的「鳳罐女工」身上，也反映到問題意識與書寫風格上。因此，努力地烘托出研究者及研究對象多元而豐富的形貌，將是本文最主要的目的，也是筆者反身性書寫（reflexive writing）的初次嘗試（後詳述）。

至於中文方面，並沒有明確探討 1960-1980 年代八重山群島鳳罐產業「台灣女工」之文獻，邱琚雯（2011a，2011b）處理的是，同一時期沖繩縣其他島嶼——南大東島的台灣砍蔗女工，分別從「離返與性別規範」（roundtrip and gender norms）（邱琚雯 2011a）、「東方主義的再思考」（Orientalism reconsidered）（邱琚雯 2011b）等不同觀點

切入。這兩篇都運用大量歷史文獻資料、社會學的田野調查以及從中所獲得的訪談資料等，捕捉當時女工的不同身影。邱琚雯（2011a）聚焦在送出地——嘉義縣大林鎮的性別規範，突顯「夫家」在她們離返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力，特別是以夫家為主、為尊所延伸出去的性別規範，如何深刻地影響著女工的移動，以及她們日後對於離返經驗的詮釋。另外，邱琚雯（2011b）此文則是掌握接受地——南大東島島民和這些嘉義大林女工的雙向凝視及互動，來捕捉台灣女工在南大東島上的真實生活形貌。

準此，為了更進一步填補這個被遺忘的歷史空缺，也為了突顯女性移工跨國生命經驗的豐厚，本文將持續 1960-1980 年代的時間脈絡，延伸邱琚雯（2011b）一文的部分視角，強調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但本文不同於先行研究的特色在於以下三點，一、調查地：從沖繩縣東方的海上孤島南大東島，移至沖繩縣西南方更接近台灣、與台灣往來更頻繁、發展更為繁榮的石垣島。二、研究對象：從短期的、季節性的、工作結束後隨即返台的砍蔗女工，轉移至沒有返台、現今仍定居在石垣島上原鳳罐工廠的台灣女工，換言之，研究對象已經從短期停留的女性移工，變成了長久定居的女性移民了。三、研究觀點：從「東方主義的再思考」，改為定調在「反身性的書寫」，也就是說，本文仍強調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但這裡的「多元」意指的是，除了跳脫當地媒體再現底下的她們外，更要強調研究者及研究對象雙方乃相互影響，研究者的我過往和書寫當時的生命態度，都會反映到研究對象的「鳳罐女工」身上，也表現到問題意識與書寫風格上。

接下來，先闡明再現、敘事、反身性三者的基本定義，以及這些在定義在本文當中的使用脈絡；其次，簡介調查地石垣島，特別是八重山鳳梨產業發展過程中石垣島居於怎樣的重要地位；接著，檢視八重山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報《八重山每日新聞》（*Yaeyama Mainichi Shimbun*）再現下的台灣女工到底為何；然後，整理出敘事中台灣女工的四種形象，陳述訪談對象的輪廓，說明研究者的我為何以及如何描繪出鳳罐工廠台灣女工的形貌；最後，反思反身性書寫的問題點。

二、再現、敘事、反身性

本節扼要闡明再現、敘事、反身性三者的基本定義，以及這些定義

在本文當中的使用脈絡。

首先，再現（**representation**）一詞是指，對於某事物、觀點或事實，以視覺或其他方式的再度呈現或創作，亦即再現非真實，而是一種建構。通過媒體，客觀世界的事物被製碼後在媒體上化為影像、聲音或文字，呈現在閱聽人面前，Starut Hall 提出再現系統（**system of representation**）之說，再現意味了形塑、選擇與呈現的積極作用，為了表達抽象概念，必須透過各種符號、論述形成的再現系統，來賦予世界意義，在這樣的過程中，媒體並非如鏡子般如實的「反映」真實，而是以自身的一套符號系統對現實進行「再」度呈「現」。（林佳儀 2008）因此，媒體是操縱者，而非反映者，中立客觀的經驗世界根本不存在，無論是媒體工作者或語言規範，都充滿了特有的社會及文化價值意涵，影像是真實的製碼（**encoding**）而非記錄（**recording**），媒體並未客觀地反映社會現狀，而是經常偏重某些社會層面，行為態度或生活方式。（張錦華 1994）本文即以這個視角，檢證八重山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報《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下的台灣女工。

其次，敘事（**narrative**）最簡明的定義是，表述（**discourse**）或表述之實例，再現一連串脈絡連貫的發生事件。敘事研究就是指任何使用或分析敘事素材的研究，資料係以故事（訪談或文獻探討中所擷取的生命故事）或其他方式（人類學者以敘事形式寫下其觀察所得的實地札記或個人信件）蒐集而得。敘事研究的基本假定為，在人類的現實中，並不存在單一的、絕對的真實，對於文本也沒有唯一正確的解讀或詮釋。敘事取向提倡多元主義（**pluralism**）、相對主義（**relativism**）及主體性（**subjectivity**）等價值。在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諸多研究裡，敘事被用來呈現社會中某些性別、種族及宗教等因素所定義之特定群體的特性或生活風格，這些社會團體時常是遭受歧視的少數族群，敘事則呈現了他們未被聽見的聲音。如果追問，為何要進行敘事研究？自身的敘事或生命故事的定位到底何在？答案是：人們天生就是說故事的高手，故事為吾人經驗提供了一致性和連貫性，在自他的溝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要瞭解一個人內在的世界最為清晰的管道，就是透過敘說者對其生活或所經過的現實，進行口語描述或故事敘說。換句話說，敘事使得我們得以瞭解人們的身分認定與人格，透過訪談中所蒐集到的自我敘事，瞭解個人身

分認定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故事即是個人之身分認定（the story is one's identity）（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 2008）。準此，透過筆者親自的訪談，本文蒐集到石垣島的台灣移民、沖繩人與原鳳罐女工等三類受訪者的敘事內容，試圖揭開不同於媒體再現下的台灣女工。

至於，反身性（reflexivity）這個概念，最早是由俗民方法學的葛芬柯（Harold Garfinkel）所提出，這個概念有數個層次的意義。首先，反身性指的是行動者有意識地面對這個世界，行動者試圖理解他所面對的情境意義，並根據他對這個意義的理解，採取適當的回應，留意這個回應對於情境的影響，據此調整自己的行動，或進一步確定情境的意義。第二層意義在於強調，社會行動自我釐清的過程，社會中每個人都預設了日常生活是有條理的，我們根據某些理路來掌握所面對的情境意義。個人在行動時，必然會對所面對的情況加以理解，試圖捕捉當下的意義，然後根據這個意義，採取適當的行動加以回應。這個回應本身，也參與了這個意義的形成。第三層次意義則是，社會學家所面對的反身性，進一步地迫使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觀點加諸自己身上。援引這三個層次的意義，彰顯反身性此一概念在本文的位置，那就是：重視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彼此間的互動，以及這些互動如何影響研究結果的呈現（黃厚銘 1999）。

以上是再現、敘事、反身性的基本定義，這些定義在本文中的使用脈絡，必須和本文的目的緊密扣連。本文的目的是去探照1960至1980年代八重山群島鳳罐產業「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這裡的「多元」意涵的是，除了跳脫當地媒體再現底下的她們外，更要強調研究者及研究對象雙方乃是相互影響，研究者的我過往和書寫當時的生命態度，都會反映到研究對象的「鳳罐女工」身上，也表現到問題意識與書寫風格上。因此，藉由援引再現、敘事與反身性這三個基本概念，進一步強化了本文的架構及接續的開展，筆者在面對《八重山每日新聞》這個文本再現下的台灣女工，以及面對石垣島上相關當事人敘事下的台灣女工時，如何展現反身性的應對，並將這個應對運用在書寫風格上，將是本文主要昭示及處理的課題。

三、調查地簡介

筆者於 2011 年 1 月中旬，從台北出發先抵達沖繩的首府那霸機場，

再轉乘日本國內航班往西南方飛行一個小時左右，到達離台灣東方外海僅 270 公里的石垣島進行調查。石垣島在行政區域的劃分上隸屬沖繩縣石垣市的一個島嶼，乃八重山政治、經濟、教育、交通的最重要樞紐，島嶼面積約 222.6 平方公里，是沖繩縣境內僅次於沖繩本島和西表島的第三大島，依據石垣市市役所公佈的資料（石垣市 2011），2011 年 1 月為止，島上人口は約 4 萬 8,746 人。石垣市是日本最南端及最西端的一個市，也是沖繩縣八重山事務所的所在地，石垣島上的行政中心。

有關八重山鳳梨產業的發展要追溯到1930年代，八重山開始實驗性的栽種鳳梨及生產鳳梨罐，當時非常仰賴台灣的企業家及技術人員之協助，1935年台中縣出身的林發到石垣島經營鳳梨園和鳳梨工廠，開啟了台灣農業移民到石垣島的序幕（林發 1984）。該地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一時中斷的鳳梨產業，到了1950年代初期重新啟動，1960年代八重山的鳳梨產業更是蓬勃發展，主要奠基於兩大政策的推動：一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對於琉球地區鳳梨罐頭輸入日本本島所採取的優惠措施、一是1960年9月琉球政府（Government of the Ryukyu Islands：指1952-1972年美國統治當今沖繩縣時設置的政府機構）公布《鳳梨振興法》（パイナップル産業振興法）進行的保護措施（水田憲志 2011），1960至1970年代全盛時期八重山的鳳梨產業及工廠如（表1）所列，都在石垣島的石垣市設廠，台灣女工也成為這些鳳梨工廠的主要人力來源。

表 1、八重山諸島鳳梨產業全盛期工廠一覽（1966 年末）

工場名	所在地	代表者名	投資会社	設立年月
琉球殖産石垣工場	石垣市新川	宮城仁四郎	大日本製糖	1955年6月
琉球殖産大浜工場	石垣市大浜			1958年6月
沖繩缶詰	石垣市大川	浦崎栄一	三井物産	1957年3月
南琉産業	石垣市新川	松坂 賢	日冷、東食	1957年6月
山晃産業	石垣市真栄里	山田義晃		1959年6月
八重山食品	石垣市大浜	竹野寛才	明治商事	1956年2月
宮原食品	石垣市宮良	渡辺喜弘	東食	1960年12月
琉球農産加工	石垣市宮良	砂川恵孝	丸紅飯田	1958年5月
琉球産業	竹富町大富	原田祐三	大洋漁業 東京口一タリ一	1957年9月
西表物産	竹富町上原	古見純盛		1960年10月

資料來源：琉球政府八重山地方庁（1967）《八重山要覽》，引自水田憲志（2011）。

四、《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的台灣女工

沖繩縣銷售量最高的兩大報《琉球新報》、《沖繩時報》（沖繩タイムス）、²以及沖繩縣最具代表性的圖文月刊新聞雜誌《沖繩影像》（オキナワグラフ）等主要媒體，在 1960-1980 年代都曾陸續報導過鳳罐工廠的台灣女工，特別是她們帶給八重山的影響，以及她們在當地實際生活工作的情形，透過這些再現的圖文，後人確實可以略微捕捉到女工的身影。譬如，創立於 1958 年的《沖繩影像》曾多次報導當時的台灣女工，以 1968 年 12 月號 22 頁〈在琉華僑慶祝民國 57 年雙十國慶〉的專刊為例，約 1600 人出席的慶祝晚會，地點是那霸市《琉球新報》的禮堂，包括短期來沖的鳳罐工廠女工及建築工人約 200 人也受邀參加。照片中坐在會場一角的女工們，專注地看著台上的歌舞表演，她們短髮、穿著無袖上衣及迷你短裙、小露大腿的模樣，和平日包裹緊身、辛勤工作的勞動形象迥然不同，讓人窺見到她們「女工之外」的俏麗身影。

本節是以《八重山每日新聞》的報導內容為文本，試圖掌握台灣女工的形象，之所以選擇該報的理由是，1950 年創刊、總社位在石垣市的《八重山每日新聞》，標榜「世界為視野，鄉土為視點」的立場，顧名思義，它是以八重山為區域對象，是八重山地區最為重要的一份地方報。³筆者於 2010 年年初，在琉球大學圖書館地下室的舊報區，搜尋 1967 年至 1972 年沖繩歸還日本、台日斷交這段期間的報紙，只要以台灣女工、鳳罐產業缺工為標題，或是內文提到任何與台灣女工相關的報導，都沒有錯過。譬如，以下三則非常簡短也不太起眼的內容：「兩位女性友人，因引近鳳罐工廠的台灣女工，而得以重逢」⁴、「台灣女工因子宮外孕急需捐血，鳳梨輸出公會八重山支部呼籲各地捐血救人」⁵、「雙十節天理教慰勞台灣鳳罐女工 42 人，華僑委員會林發、天理教本部及沖繩教區亦派人出席」。⁶然而，為了掌握媒體再現下台灣女工的主要特質，必需符合

² 這是依據日本 ABC 協会「新聞発行社レポート普及率」2013 年 7-12 月的資料，沖繩縣以各報社公佈資料為準（読売新聞広告ガイド 2014）。

³ 另一份地方報是 1977 年創立、立場相對保守復古的《八重山日報》。

⁴ 《八重山每日新聞》1967 年 8 月 8 日。

⁵ 《八重山每日新聞》1967 年 8 月 12 日。

⁶ 《八重山每日新聞》1971 年 10 月 12 日。

「類似且經常出現」或「非經常出現、卻以斗大標題突顯」之兩大原則，才成為本文整理的對象。因此，經由篩選後發現，《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下的台灣女工有兩個極為鮮明的身影：「替代性的勞動者」和「寄生蟲的高帶原者」，簡言之，「替代性的勞動者」屬於類似且經常出現的內容，「寄生蟲的高帶原者」則是非經常出現、卻以斗大標題突顯的內容，分述如下。

（一）替代性的勞動者

從 1960 年代開始，由八重山移往日本本島的就業人數就逐年增加。依「八重山公共職業安定所」發表的《八重山勞力市場現況報告》，八重山的求職者及求人者其實都不少，但是供需雙方的勞動條件無法吻合，已出現潛在失業者的窘境，當地年輕人大多嚮往到日本本島去就業，⁷ 使得當地鳳梨罐產業面臨棘手的缺工問題，在鳳梨採收及鳳梨罐作業的農忙時節，業者得不斷釋出獎勵出工、補工的各種利多消息。

舉例來說，1968 年 8 月底適逢鳳梨採收旺季，鳳梨業者害怕果肉腐敗滯貨，為了確保女工在廠線上順利作業，首次祭出「精勤賞」的獎勵，發給五天全勤工人每人美金 1 塊錢。⁸ 到了 9 月初又因颱風逼近的關係，各地鳳梨田提早強行採收，使得人手不足問題再度浮現，仍必須尋找當地女工人手，因此，連那些平日並非從事鳳梨採收或鳳梨罐產業的人，包括：學校親師會的會員、婦人會的婦女、區公所女職員、商店街銀座通的女會員等，都被一一動員出來。⁹ 又如 1970 年 10 月初的採收時節，因 9 月底以來的連日陰雨，使得鳳梨早熟滯貨量大增，不少果肉腐爛發臭，業者只好忍痛丟棄損失慘重，加上人手不足缺工嚴重，不時用宣傳車巡迴大街小巷，呼籲婦女出來打工協助。甚至連未滿十五歲的中小學生，晚上都被找去鳳梨工廠加班，有人還因此斷指受傷，「八重山勞動基準監督署」對這些鳳梨業者提出警告，可能因不當雇用童工違反勞基法而受罰。

可以窺見的是，離島勞動力不足的窘境，以及業者為了填補勞動力

⁷ 《八重山每日新聞》1968 年 8 月 18 日。

⁸ 《八重山每日新聞》1968 年 8 月 29 日。

⁹ 《八重山每日新聞》1968 年 9 月 5 日。

不足所做的各種努力，但是，仰賴當地勞動力顯然已經不夠，於是招募其他離島女工甚至台灣女工，成了不得不的替代方案。其實早在 1962 年沖繩便以「技術導入」之名，招募台灣農業技術人員前來指導鳳梨栽培及果樹接枝等技法，同時，台灣和琉球政府之間也簽訂和約，允許每年引進約兩千名的農業技術人員及季節性移工，也就是本文中前往沖繩協助鳳梨採收和鳳梨罐加工的女工。鳳梨業者之所以考慮從鄰近的台灣引進勞工，主因是台灣工人的技術精良、任勞任怨的勤奮態度、薪資比本地工人低廉，台灣女工的到來確實讓當地果農及鳳梨業者「大大鬆了一口氣」！¹⁰但是，台灣女工的進入仍無法填補八重山所有缺工的黑洞，業者還是得向沖繩其他離島招募人力，甚至包括那些已經在沖繩本島或其他離島工作的台灣女工。

1968 年鳳梨採收旺季的 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期間，「八重山公共職業安定所」再次向離島宮古島的市町村長們求援，希望派遣女工前來協助，但反應並不熱絡。宮古島的女工大多選擇前往沖繩本島工作，因為，該年沖繩本島和八重山鳳梨工廠的作業期幾乎重疊，她們寧願前往充滿活力的沖繩本島，也不想來到偏遠的八重山，加上該地鳳梨工廠的薪資並不多，工作天數也不長，跨海來此一趟並不划算。¹¹沖繩其他離島的人不願來八重山工作，鳳梨業者為了趕緊補工，只好調度已經在沖繩本島或其他離島的台灣女工前來協助。1968 年 10 月中旬正逢鳳梨採收的第二旺季，就借調了沖繩本島十二座鳳梨工廠的台灣女工 350 名，讓她們回到石垣島的鳳梨工廠工作。¹²又如，1969 年當年在台招募鳳梨女工並不順遂，離島女工的調度也不如預期，6 月中旬「沖繩輸出鳳梨罐頭公會」決議，借調離島南大東島上的台灣砍蔗女工 133 名，讓她們結束砍蔗後繼續輾轉到石垣島的鳳梨工廠。¹³

透過以上的說明可以清楚看到，《八重山每日新聞》將台灣女工再現成鳳梨產業非常重要之「替代性的勞動者」，和沖繩其他離島（宮古島）的工人共同填補了當地勞工不足的缺口，背後的原因是「沖繩本島→沖

¹⁰ 《八重山每日新聞》1968 年 2 月 22 日、1968 年 8 月 18 日。

¹¹ 《八重山每日新聞》1968 年 8 月 21 日。

¹² 《八重山每日新聞》1968 年 10 月 12 日。

¹³ 《八重山每日新聞》1969 年 6 月 14 日。

繩離島→台灣」三地薪資的高低落差，造成「台灣→沖繩離島→沖繩本島」三地人口移動的趨向，女工的到來，被當地鳳罐業者引領期盼，她們的出現，說明了離島經濟發展不得不養賴外籍勞工的無奈。

（二）寄生蟲的高帶原者

1969 年 7 月 10-11 日《八重山每日新聞》兩天出刊的斗大標題：「鳳罐工廠 88% 的台灣女工糞便含有寄生蟲，幾乎都是不合格者，丟出問題給寄生蟲防預協會」、「寄生蟲的高帶原者被強制遣返，其餘者徹底投藥驅蟲，鳳罐業者想對策，解決台灣女工不適任問題」。根據該報導的闡述，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所有鳳罐工廠的男女作業員，基於《食品衛生法》都得接受例行的糞便檢查，他們必須是健康的、手腳沒有傷口的、腸內無寄生蟲者，鳳罐屬於國際化商品，從事該食品加工的女工之健康問題，一定會受到嚴格的檢測。接受檢查的 128 名台灣女工裡，有 115 人也就是高達 88.1% 被檢查出體內有寄生蟲，包括十二指腸蟲、蛔蟲、鞭蟲，幾乎都不合格。八重山保健所面對沖繩寄生蟲預防協會的這份檢查報告，開始大力宣導驅蟲對策及投藥方法，加強灌輸台灣女工公共衛生觀念，但女工以「在台灣從來都不必檢查」為由加以拒絕。沖繩輸出鳳罐工會八重山支部也認為事態嚴重，緊急聯絡鳳罐業者協商對策，提出具體措施：強制遣返寄生蟲的高帶原者（指同時檢測出體內有三種寄生蟲者），對留下來的女工徹底進行投藥驅蟲，加強生活環境的消毒，避免再感染給他人。這種例行檢查不僅只針對台灣女工，1971 年 8 月 4 日《八重山每日新聞》以標題「檢查島內鳳罐女工，保健所和寄生蟲預防協會攜手合作」再次強調，西表島東部和石垣島島內六座鳳罐工廠的當地女工都必須接受檢查，列出各廠女工體檢人數及檢查日期，來自台灣和宮古島的女工也包括在內。從這兩則斗大的報導能夠窺看出，台灣女工被《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成寄生蟲的高帶原者，似乎也等同被宣判是骯髒的、不潔的。¹⁴

¹⁴ 包括台灣在內當今許多引進外勞的國家，似乎都可看到此一現象，政府或醫界以健康管理、公共衛生等考量為由，進行強制而必要的身體檢查，檢查結果則由媒體發佈，對這些外來者通常會貼上不太友善的標籤，並和特定疾病、疫情等議題相連，可能間接加深了接受國百姓對這些外來移工負面的刻板印象（吳麗珠、黃彥芳、楊靖慧 2009；章門煌、林玲媛、徐慧貞 2007）。

本節從「替代性的勞動者」以及「寄生蟲的高帶原者」這兩點，捕捉到《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下的台灣女工，她們是被當地鳳罐業者引領期盼的人，也是被寄生蟲預防協會嚴正宣判的人。這兩種身影的出現，主要是從接受國鳳罐業者及當地政府的立場出發，著眼於勞力不足問題的解決和外勞健康隱憂的管控，然而，女工在當地的實際生活作息，乃至於女工本人的想法、心聲與真實感受等，完全不被重視，自然也沒有被報導出來。因此，除了接受國當地媒體再現下的台灣女工外，筆者更進一步地想找出她們的其他身影，特別是能夠彰顯女工主體性的相關內容，於是決定在隔年前往石垣島，透過實地訪談、聆聽敘事等研究手法，挖掘到迥然不同於媒體再現下的台灣女工。

五、敘事中台灣女工的身影

筆者於 2011 年 1 月的寒冬，在陰冷偶晴的石垣島進行調查時，透過當時琉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的台灣籍女博士生、華僑總會八重山分會的會長、《八重山每日新聞》的資深記者等多人的鼎力協助，以及個人主動和石垣市立圖書館中年女性館員的攀談，陸陸續續尋覓到相關的受訪者，分別以日語及閩南語進行訪談，過程中令人沮喪的不愉快很少出現，筆者在沒有特別預期的心情下順利地進行。台灣女工雖是本文的主角，但因停留時間短暫等因素限制，筆者只訪談到三位（表 3），其他十位受訪者（表 2），則提供了報章雜誌之外相關或不同事件的可能視角。本研究的受訪者包括以下三種人，分述如下：

（1）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台灣移民（表 2）共七位：受訪的移民對於女工的回憶大多零碎且彷彿隨風而逝，譬如，島田是台灣移民的第二代，父親是 1930 年代和林發一起移住石垣島開發鳳罐產業的重要先人之一，他回想起和台灣女工的唯一重疊是，曾經在華僑總會負責處理女工的簽證事務，因印章文件沒有備齊而發生過些許摩擦。島本也是台灣移民的第二代，老家是栽種鳳梨的果農，而非經營鳳罐工廠的業者，因此，要和鳳罐工廠內的台灣女工相遇或有所交集並不容易。他只淡淡地回想說，父親曾帶台灣女工來過家裡，自己本身經常送鳳梨去鳳罐工廠時也見過女工，但僅止如此，彼此並沒有進一步的互動。六十歲出頭的玉子，是石垣島著名鳳罐產業「山晃產業」的台灣媳婦，父親是台北的生意人，

製造販售鳳梨沖心去皮機而認識「山晃產業」的董事長，也就是他後來的公公，因而結為跨國親家。她平靜地說道，「山晃產業」從創業到收工大約只有二十年的榮景，也就是 1959-1980 年這段期間，她嫁來不久的 1981-1982 年鳳梨工廠就已停工，當時的台灣女工也不多了，但家裏還留有公司舉行年度運動會時的獎品名單，台灣女工也名列其中。

(2) 曾經管理或接觸過台灣女工的鳳梨產業男性職員(表 2) 共三位：宮良、根間、吉見三人均是六、七十歲的沖繩男性，他們都曾來過台灣，對於台灣和台灣女工的印象都很不錯，面對筆者千里迢迢的到訪，也釋出相當的善意以及小小的驚奇。他們都是在二十幾歲還很年輕時，分別在「山晃產業」、「沖繩罐頭株式會社」(沖繩缶詰株式会社)等當時石垣島上頗具盛名的鳳梨產業任職，而有機會和台灣女工連接，留下深淺不同的記憶。例如，宮良對於女工的日常生活習慣：作息規律、早飯前固定向神明燒香祈求、不喝生水、多油炒菜、常常吃蘋果等留下鮮明的印象；根間幾次開車接送女工往返時，在車內覺得她們講話很大聲，感覺像在吵架。

表 2、石垣島的台灣移民與沖繩人

化名	性別	年齡	身份特質
島田	男	65	台灣移民第二代，家種鳳梨，見過女工。
島本	男	60	台灣移民第二代，種植鳳梨，送貨去鳳梨場時見過女工。
吳屋	男	58	台灣移民第二代，華僑總會八重山分會會長，認識女工。
阿媽	女	80	台灣餐廳老闆娘，丈夫和年輕女工私奔回台。
阿丹	女	60	吳屋的台灣妻子，認識留下來的女工。
玉子	女	61	山晃產業的台灣媳婦，1980 年嫁來，耳聞女工軼事。
絹子	女	50 多	吳屋的妹妹，只知道女工的存在，但未見過。
宮良	男	73	23-27 歲時擔任山晃產業勞務課長，管理女工。
根間	男	64	23-28 歲時負責沖繩罐頭公司農場業務，接觸女工。
吉見	男	77	26-34 歲時負責沖繩罐頭公司製造業務，管理女工。

(3) 定居下來的原鳳罐工廠的台灣女工(表 3)共三位：春子、菜子及仲里三人因緣際會來到八重山工作，並選擇定居下來，脫離貧困是她們出國的共同強烈動機之一，她們也都以絕處逢生的心情，開展自己在異地的新人生，但仍有各自的出身背景，分別以已婚、單身、失婚等身分來沖工作，對於周遭世界有著不同的接觸與體悟，經驗了移入、遷徙、定居等各階段的生命歷程。訪談這三位女工都是在她們的家屋，讓筆者可以窺看到她們居家生活的片面，從居家生活的觀察，包括明顯的物質生活條件(居住品質及居家環境)及家人關係(家族照片的擺放)等，可以更加去揣摩、連結她們敘事內容的脈絡。

表 3、石垣島的台灣女工

化名	來沖時間	年齡	出身地	學歷	配偶
春子	1970 年	70	彰化田中·永靖	不識字	台灣人
菜子	1970 年	61	彰化員林	國小畢業	沖繩人
仲里	1984 年	55	基隆(父台灣人、母石垣島人)	國小畢業	沖繩人

藉由上述三種報導人的口述敘事資料，筆者採取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去歸納相關的意義本質，此處的「主題」代表的是：訪談中經常出現的元素，像受訪者的主張、慣用語或情境脈絡下的意義等，主題分析就是將這些主題再現的過程。當我們研究生活經驗描述、辨明這些逐漸浮現的主題時，就會發現這些描述的經驗中，不斷重複出現且具共通性的內容，就是我們要探尋的主題。此外，主題分析法的另一特色是，強調發現取向(discovery-oriented)的開放編碼，找出現象的意義，並詮釋該現象如何被經驗，當我們在主題命名時，也會凸顯它的發掘、發現、發明之特性，並以創見巧思的適當修辭加以命名(高淑清 2008)。

準此，本文整理出「絕處逢生的移民」、「勤奮打拼的勞工」、「開拓格局的異鄉客」、「被投射的認同對象」這四點，去捕捉女工在島上的多元身影，那麼，四種形象間的關係與差異又是什麼？前三項「絕處逢生

的移民」、「勤奮打拼的勞工」、「開拓格局的異鄉客」欲突顯的是，台灣女工跨國遷徙後努力打造自我主體性的那個身份，其中，「絕處逢生的移民」強調女工遠走他鄉後的奔波與辛酸，「勤奮打拼的勞工」則聚焦鳳梨罐工廠內女工勤勞熟練的工作態度，「開拓格局的異鄉客」捕捉了女工試圖跳脫固定的廠區生活空間及擺脫「女工」此一身份所做的突破。相較於前三項，第四項「被投射的認同對象」欲彰顯的是，因女工的出現及到來，石垣島上的沖繩人以及第二代的台灣移民如何建構出對台灣的依戀和想像，換言之，台灣女工成了他人眼中異文化認同的投影。

還有，必須言明之所以會拼湊出這四種身影，除了整理受訪者的敘事內容做為論證的依據外，研究者及研究對象彼此相互影響、難以切割的這個事實是存在的。所謂的反身性指的正是，研究過程中不排除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干涉及影響，並從此一過程中分析研究對象，而非只是事後透過反身性來解釋研究對象以往的經驗，或以此來解釋口述訪談的內容。那麼，本文中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互動過程為何，又，這樣的互動如何影響到研究結果的呈現？一、互動中筆者對於受訪者敘事內容高度「相應」之處，此處的相應並非意味了我親身經歷過受訪者的敘事時空，而是在聽聞的過程中發現，自己過往及書寫當時的生命經驗和由此所牽引出的感受，與台灣女工高度雷同。因此，自然地將此感受反映、投射到女工身上，是故，筆者書寫的既是台灣女工、也是我自己，文中呈現出台灣女工的四種樣貌，基本上均屬之。二、受訪者的敘事內容筆者並未親身經歷，但卻是多數受訪者共同提及、反覆出現之處。譬如，鳳梨工廠內處理鳳梨果肉的勞動光景，筆者當然不曾經驗，卻是三位女工異口同聲侃侃而談的；還有，台灣女工對於石垣島鳳梨罐產業的經濟貢獻，筆者未曾目睹當時榮景，卻是台灣移民以及曾經管理或接觸過台灣女工的鳳梨產業男性職員不斷強調的。簡言之，台灣女工之所以呈現出這四種樣貌，是筆者聽聞到、採集到之後所勾勒出來的，同時，從受訪者敘事內容的茫茫大海中，筆者也反芻到自身的特質或生命態度，研究者與受訪者的互動確實影響到研究結果的呈現，真實歷歷。

可以說，當我在書寫「絕處逢生的移民」、「勤奮打拼的勞工」的台灣女工時，其實，是在書寫從過去到現在一直以來的自己，那個不願被輕易打倒、永遠努力不懈、勇往直前的自己。同樣地，當我在書寫「開

拓格局的異鄉客」的台灣女工時，其實，也是在書寫中年焦慮的自己，那個渴望跳脫既有身份、轉進不同軌道、飾演全新角色的自己。¹⁵最後，當我在書寫「被投射的認同對象」的台灣女工時，也是在書寫那個經常被具有殖民情結的日本人「錯愛」的自己，二十多年來赴日留學、返國、再赴日的不斷離返經驗中，我經常被期待去扮演某些日本人認同、想像台灣時的化身對象。接下來，整理出的四種身影之具體輪廓，分述如下。

（一）絕處逢生的移民

女工遠走他鄉後的奔波與辛酸是共通的，三位受訪的女工當中，已婚攜眷、年紀最長、自認從小就吃很多苦的春子，慢慢地吐露當時選擇出國的原委。四十年前老家彰化農村的勞動力開始過剩，但工資普遍太低，大家都想出國工作，加上她的婆婆高壓嚴厲而恐怖，丈夫到沖繩打工賺的錢、寫的信都不曾轉交給她，讓春子決意帶著四個年幼子女遠離台灣，隨夫家的男性族人依親來沖打工。¹⁶她最早抵達的並非石垣島，而是到小浜島的製糖廠和西表島的鳳罐工廠兩地，因為老闆是同一人，都用小船載工人們來來去去。

春子是全家陸陸續續移住到沖繩的，欣慰的是，四名子女都很體諒，彼此互相照顧，從小就協助父母做家事。她記得在小浜島工作時，親切的沖繩鄰居也會幫她帶小孩，工廠的領班中午也偶爾開車載她回家偷看小孩，當她見到兩歲的兒子無知地在喝地上的髒水時，只能遠遠看著他的背影，含淚再回到工廠……。春子是舉家移住，因此養活一家六口，成了她和先生的重要任務，她不禁意地感嘆，過去那段省吃儉用的困頓生活：

¹⁵ 近年來，學術世界的反身性書寫很多，以劉紹華（2010）在露思·貝哈（Ruth Behar）《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中文版導讀為例，她認為作者展露其脆弱易感、容易受傷的情緒書寫與書寫情緒，實驗一種書寫型態，將個人納入其中，聚焦於觀察者的見證意義。受傷的目的不是為了心傷，而是為了超越，超越那些若不受傷即無緣跨越的限制。面對苦痛，深入揮之不去的記憶與觀察，正視它、分析它、理解它、原諒它，以達成自我化解乃至心境平和，以人類學者跨文化、跨時空（傳統與現代、本地與他處）的思考脈絡來進行這項精神治療。

¹⁶ 國永（2011）的研究發現，台灣女工出國的動機其實很多，特別是「年輕未婚」的女工除了考量當時八重山的雇用條件比台灣好之外，好奇心的驅使、想買日本製產品順便做跑單幫、想脫離農村社會中父母的掌控等等，都是促使她們出國的原因，這點和「已婚的」春子強調渴望脫貧的動機非常不同。

「為了趕快多賺點錢，我白天在甘蔗園剉甘蔗，晚上繼續到糖廠加班，晚班工錢比較多，主要工作就是把砂糖裝入袋子裏。糖廠加班時，老闆會送給每人一包泡麵，我連這個也省下來，第二天早上加點青菜當成一餐給小孩吃，我自己啃幾口甘蔗就算過去了……。剛來沖繩的前半年都是吃罐頭，根本沒買過新鮮蔬菜，我先生買過一次，真地太貴了。後來，我還偶爾去偷拔別人菜園的野草青菜，水果也幾乎沒買過，都是摘山腳下野生的金桔來吃。」（春子 2011.01）

從春子的口述中可以推測，她毅然決然遠離台灣來到沖繩的前後，其生活都是極其艱辛困頓的，在沒有退路、只能拼命向前的強大信念下，她開展了另一頁絕處逢生的樂章。當我在春子有點殘舊的家屋客廳中訪談她時，她拿出四十年前最後和先生、孩子們離開彰化老家時，親友在台鐵月台上的送行照片，那時身穿紫色迷你短裙、梳了摩登髮型、臉上堆滿臉容的她，對照受訪當天她也身著紫色上衣、老邁溫吞且不時的怨嘆，除了讓筆者感受到歲月不饒人的殘酷外，她的神情流露出更多的是，老後在異鄉孤伶生活的滄桑和悲涼。

（二）勤奮打拼的勞工

台灣女工既然是以「勞動者」的身份出現，她們實際在鳳梨工廠的工作身影當然值得掌握，勤奮打拼的勞工形象，不僅是當地人口中嘖嘖稱讚的話題，也是女工自我津津樂道的重點。

首先，是出自於身材粗曠、略微肥胖的宮良，五十年前大學剛畢業後不久，他就在當時頗具規模的「山晃產業」擔任勞務課長，一待就是四年，不只負責管理鳳梨工廠女工的生活起居和工作狀況，也曾來到台灣招募女工，對於女工的觀察以及與之互動的經驗算是很多的。宮良非常肯定多數女工勤奮賣力的工作態度，以及補充石垣島當地勞動力不足所做出的經濟貢獻，他認為絕大多數的女工都是抱定「短時間內賺大錢」的心態而出國，所以，總是拼命工作、賣力加班、努力存錢，更何況當時流通的貨幣還是美金。¹⁷ 其次是來自於吉見的口述，他回想自己當年

¹⁷ 根據那谷敏郎撰文、栗原達男攝影（1969）〈石垣島的台灣勞工〉這篇報導，原則上鳳梨工廠的加班不能超過晚上十點，加班費以時薪的 1.25 倍計算，但 10

站在石垣島的港口碼頭等待女工的到來，島上主要七間鳳罐工廠同時派專車迎接台灣女工，可說是車水馬龍、盛況空前。談到女工們在鳳罐工廠內的工作狀況時，他說「沖繩罐頭株式會社」聘僱的台灣女工多以「技術導入」之名引進，她們原本就在台灣當地的鳳罐工廠工作，因此，對於鳳梨加工的流程非常熟稔，挖鳳梨的黑眼、剝鳳梨的頭尾（斬頭尾）等技巧相當純熟，完全無需再做特別訓練或說明。¹⁸

至於三位女工當事人，又如何自我詮釋在鳳罐工廠廠區內的工作實況呢？

還在重感冒、仍堆滿笑容接受我訪談的菜子，原本她就是彰化員林鳳罐工廠的女工，十九歲時和工廠其他的單身姐妹淘們，以「技術導入」之名來沖工作。菜子最初的工作地點不是在石垣島，抽籤唱名後被派到西表島「琉球產業」的鳳罐工廠，她頗為自豪地說，自己就是以「技術導入」之名出國的，對於鳳罐工廠內的作業，包括：斬頭尾、挖鳳梨的黑眼、裝罐頭、裝箱出貨等流程都很嫻熟。美艷動人的仲里，只在鳳罐工廠待過兩個夏天，當時還在石垣島的台灣女工已經很少，她在鳳罐工廠的主要工作地點位於二樓，負責將罐頭清空，並沒有直接觸碰鳳梨的果肉或果皮。她說鳳梨汁對皮膚不好，接觸久了容易引發過敏，她偶爾會下去一樓幫忙，切鳳梨、挖鳳梨眼的工作也難不倒她。至於春子，則不急不徐地說出當年在鳳罐工廠的勞動情形，削鳳梨皮是機器在做，女工負責的是剝鳳梨的頭尾，算是工廠中難度較高、薪水較好的工作，因為需要用力，每天還得磨刀，所以經常弄到手指、手腕、關節疼痛不已。像春子一樣，攜家帶眷來沖工作的台灣人大多選擇這項工作，相對地，比較輕鬆且薪水不高的是挖鳳梨的黑眼，單身來此的年輕女工傾向做這份工作。

由此看來，台灣女工在鳳罐工廠的勞動身影是勤奮賣命、技術嫻熟的，不僅受到當地鳳罐工廠管理者的高度肯定，也是女工們自我津津樂道的所在，這點也呼應了前述《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下的台灣女工——「替代性的勞動者」確實所言不虛。可以推測，就是因為女工們勤奮

點之後以時薪的 1.3 倍計算。

¹⁸ 但吉見對少數女工的「特殊行徑」還是有些微詞，譬如，偽造上下班的打卡記錄、竄改資料卻領同樣薪水，這些事甚至驚動台灣的勞工局派人前來調查。

打拼的好口碑、好實力，才會被當地鳳罐業者引領期盼、念念不忘。

（三）開拓格局的異鄉客

台灣女工雖然是以勞動者的身份渡海而來，但她們真的不只是、也不甘心只是「女工」這個身分而已，也不願意生活場域只侷限在偏遠離島，或是鳳罐工廠廠區那個狹隘、單調又同質性高的勞動空間，因此，有些女工成了努力開拓格局的異鄉客，試圖從「空間」及「身份」上去突破、去轉換在島上的生活。

吉見明白地說，第一次跨海來島的女工，毫無選擇地只能乖乖照順序拿號碼牌，前往被指定的鳳罐工廠報到，地點可能就在石垣島上，但也可能在遙遠的另一處離島，像西表島那樣不方便、又黑又暗、沒有電氣器設備的偏遠地帶。但是，那些來過幾次石垣島的女工就精明多了，她們會事先偷偷和菜鳥女工換號碼牌，因為，大家都想待在離市區較近的工廠，收工之後能享受一點熱鬧繁華，至少逛街購物會比較方便。從吉見的旁察中可以推知，女工的生活作息主要圈限於廠區，但她們對於廠區之外的世界，仍有一定的期待和嚮往。¹⁹宮良也坦承，有鑑於勞動基準條例或安全管理的諸多顧慮，和來自宮古島或石垣島當地的本國女工相比，負責管理女工生活起居的他，會更加留意台灣女工的人身安全，公司也會要求她們必須五、六人同行始可外出，也就是只准女工集體移動，個人獨行是不被允許的。即便公司有如此的規定，但仍無法阻擋那些想要掙脫廠區工作生活束縛的台灣女工。

菜子出國時才十九歲，單身又年輕，對於異國的外在世界充滿好奇，可以想見，她的視野不只侷限在鳳罐工廠內而已。她緩緩而無奈地道出來沖工作的原因，父親長年病痛纏身、又被人倒會，出國是為了幫忙還債，而且家中兄弟姊妹有八人之多，食指浩繁，脫離貧困算是她很強烈的出國動機。但隨後話鋒一轉、神情一亮地不忘強調說：「當時大家都說沖繩這裡好，有政府出面掛保證（指中琉文化經濟協會），²⁰不需仲

¹⁹ 〈石垣島的台灣勞工〉這則報導曾提到，鳳罐工廠女工宿舍狹小，有三個大房間，一間當餐廳使用，她們幾乎沒有到過街上，也沒有運動，顯然只是片面之見（那谷敏郎、栗原達男 1969）。

²⁰ 有關「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如何主導當時移工的派遣業務，可參考邱琬雯（2011a）。

介費，連船費都免了，感覺可以出國玩一趟見識見識，所以，台中邱姓仲介商來工廠找人時，我們這些原本就在鳳罐工廠的女工們就決定一起報名出國了。」剛到這裏的頭一個月，菜子坦承確實也很想家，捧起飯碗就滴滴答答地掉下淚來，女工們常常彼此哭成一團，後來有錢賺，領到薪水時很開心就不再哭了。她說西表島地處偏遠，下班之後根本無處可去，廠區內設有娛樂室供女工跳舞；石垣島就熱鬧很多，夜間的娛樂活動不少，當時流行打保齡球，偶爾也會去看看電影或跳舞，有些台灣工人晚上會結伴出去釣螃蟹當做食材。因為菜子具備「技術導入」的身分，工作期滿辦理簽證延長時較為容易，後來又輾轉到農園及小浜島的製糖廠，最後終於回到熱鬧的石垣島，在「沖繩罐頭株式會社」的鳳罐工廠繼續工作，因工廠友人的介紹認識當地男性，通婚才定居下來，結束了她在八重山整整六年的女工生涯。

一派優雅紳士作風的根間，慢條斯理地娓娓道出和台灣女工的短暫交集，四十年前他才 23-28 歲的這五年期間，曾在當時頗具盛名的鳳罐產業「沖繩罐頭株式會社」任職，主要負責農場方面的業務，有時因人手不夠，會在鳳罐工廠休工的空檔，調度一些台灣女工來農場幫忙，根間對於鳳罐工廠女工的招募、雇用、乃至來島之後她們的生活起居並不十分清楚。但是，比較特別的是，當時正逢石垣島鳳罐產業最鼎盛的時期，沖繩縣也還處於美金交易的年代，餐廳酒吧、夜店舞廳四處林立，年輕瀟灑的根間也是常客，晚上下班後，都會流連黑貓、紐約、銀座等店家小酌兩杯，幾次聽聞中，確實有台灣的鳳罐女工在這些地方陪酒或打零工。

那麼，是否真有其事呢？個性開朗積極、為人豪爽的仲里，是個美麗大方的台沖混血兒，28 歲失婚後單親扶養兩個小孩，為了生計也為了散心，第一次漂洋過海踏上母親的故里石垣島。仲里為了趕快賺到更多的錢，她不想縮限只做鳳罐工廠內的工作，即便有很多加班的機會。不同於別的台灣女工，傍晚時分一到，她就趕緊搭上廠區免費提供的巴士，到大街的餐廳、酒店去打工，當時的鳳罐工廠並不會拘束或禁止她們兼差。仲里一邊撩撥捲髮，一邊閃爍著眼睛興奮地說：

「出來餐廳、酒店打工真的好處多多，可以趕快賺更多的錢，還可以學些日語，端菜可以認識很多人（她和後來再婚的先生

就是在餐廳認識的)，我本身也喜歡和人交際，只要滿臉笑容就行了。還有，我可以打包餐廳的菜尾（剩菜），當作第二天在鳳罐工廠宿舍的中餐，不用再花時間煮，也省下自炊的電費，還可睡個午覺休息一下，補充之後更多的體力。……」（仲里 2011.01）

在筆者訪談接觸過的台灣移民當中，對台灣女工抱持最不堪回憶的可能要屬高齡八十的台灣阿媽了，根據吳屋之妻阿丹的說法，原本阿媽和先生一起在石垣島共同打拼，經營高級的台灣料理餐廳，當起人人稱羨的頭家娘，沒想到丈夫卻和來此年輕貌美的台灣女工私奔回台，一直到他過世為止。

從上述管理或接觸過台灣女工的鳳罐工廠男性職員的口述以及女工自己的說明來看，「女工」，只是一個短暫的標記和身分，是她們和八重山這個異地開始連接的重要節點（nodal point）。但是，菜子下工後想到熱鬧的大街遊逛開擴眼界，仲里大方提及她到高級台灣餐廳打夜工的英勇事蹟，不可否認地，和餐廳老闆人夫私奔回台的女工也的確存在，可以看到，這些鳳罐產業的台灣女工勇敢無畏地從「空間」及「身份」上去自我突破，努力地在異地開拓自己想要的生命格局，讓人見識到她們「女工之外」的不同模樣。筆者在菜子寬敞整潔的家屋中，看到牆上掛滿了不同時期的全家福照片，訪談當天她重感冒尚未痊癒、還戴口罩不時咳嗽，但仍心滿意足地娓娓道出對自己人生的回顧：「當初能夠出國工作是幸運的，能留下來和當地人結婚生子、擁有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的！」

（四）被投射的認同對象

筆者在訪談過程中也意外發現到，台灣女工除了積極打造在異地的生活格局、擴充自我的主體性之外，她們的現身不知不覺中也強化了當地人，包括經歷殖民時代的沖繩人和第二代台灣移民這兩類人對於台灣的想像，也就是說，鳳罐工廠的女工是當地人投射出來的認同對象。²¹可由兩個例子來說明：管理女工的鳳罐產業男性職員吉見、第二代台灣移

²¹ 國永（2011）的研究也指出，石垣島上沖繩人殖民時代的個人經驗也牢牢鑲嵌於他們和台灣女工的互動過程中，並且，這樣的經驗與互動「有助於」台灣女工在當地的工作和生活。

民吳屋。

大病初癒、聲音仍帶點沙啞的吉見，是三名曾經管理或接觸過台灣女工的鳳罐產業男性受訪者當中，年紀較長、口音頗重、但最能侃侃而談的一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 1944-45 年期間，為了躲避美軍的空襲轟炸，吉見舉家曾搬到台南新營生活過一年多（松田良孝 2010）。當時，他已是小學一、二年級的孩童，對於殖民地台灣留有特殊的深厚情感，這份情感也延伸到後來他和鳳罐工廠台灣女工的互動。吉見是在「沖繩罐頭株式會社」任職，工作長達十一年之久，26 歲至 34 歲的八年期間擔任製造科科長，就是負責管理鳳罐工廠台灣女工的出入境接送、生活起居以及工作分配。吉見的父親就是「沖繩罐頭株式會社」的重要高階主管，偶爾會帶女工來家裡做客吃飯，增加了他和台灣女工不同近距離接觸的機會。他自然而坦白地訴說著自己和台灣女工的交集：

「我經常免費幫女工貼郵票寄信回台灣，女工返國時帶了過重的香菸、養命酒時，海關都會囉唆刁難，我大多出面緩頰說情，也回送琉球洋娃娃給女工當紀念品，同樣地，台灣女工也送我紹興酒做回禮，雙方依依不捨、含淚告別的場面，幾乎年年上演啦……。」（吉見 2011.01）²²

此外，比起本研究中其他受訪的台灣移民，經營果菜批發多年、也是現任華僑總會八重山分會會長的吳屋，對於台灣女工有著一股欲言又止的眷念與追憶。吳屋的父母親是第一代台灣移民，栽種鳳梨的果農，當時的他必須常常運送鳳梨去鳳罐工廠，因緣巧合地認識不少來此工作的台灣女工。身材高瘦黝黑、一臉忠厚老實、笑容靦腆、已經為人祖父的吳屋回憶說：

「每當送完貨要返家時，我都會去女工宿舍打聲招呼，宿舍管理員是一位稍微會說日語的台灣歐巴桑，²³女工們下班時間都是

²² 根間坦承，確實也有少數沖繩人的確會用「歧視性」字眼稱呼這些台灣女工，但他都會出面禁止，他說知道女工很多是來自貧困農村，努力工作只是為了賺錢而已，且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留下來，沒有必要如此。

²³ 國永（2011）的研究提及，在殖民地台灣曾接受過日語教育、會說日語的年長女工，通常擔任招募女工、照顧女工、女工班長、炊事領班等職務，她們的薪資較一般鳳罐工廠廠區女工高，負責翻譯溝通，協助鳳罐工廠及台灣女工雙方。

傍晚，如果遇到女工正在吃晚餐，我通常也會被留下來一起用餐。當時，鳳梨工廠女工的年齡大概都在 20-23 歲之間，女工把我當成弟弟看待，雖然雙方關係不錯，但因為我台語說得不好，女工不會講日文，我們彼此的交流仍然有限。……女工裡面有好幾個年輕又可愛的小女生，或許是日久生情吧，也強化了我對台灣的想像與認同，促成我後來第一次踏上台灣，完成探親之旅的願望。」(吳屋 2011.1)

由此觀之，台灣女工成為經歷殖民時代的沖繩人以及第二代台灣移民對於台灣認同的具體投射對象，這種來自他人深情款款的依戀和想像，已超出女工原本來沖的目的與預期了。前三項「絕處逢生的移民」、「勤奮打拼的勞工」、「開拓格局的異鄉客」突顯的是，台灣女工跨國遷徙後努力打造自我主體性的那個身份，相對地，「被投射的認同對象」敘事中的台灣女工看似被動，甚至也可能不是她們自己所料想的，但卻活生生地烙印在當地人的腦海，多年之後仍未散去。

縱觀上述，本節跳脫了《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下的台灣女工，也就是「替代性的勞動者」以及「寄生蟲的高帶原者」這兩點，透過在石垣島實地的訪談和敘事資料，進一步找到了女工的其它身影，探照出女工迥然不同的四個面貌：「絕處逢生的移民」、「勤奮打拼的勞工」、「開拓格局的異鄉客」、「被投射的認同對象」。

無論是主體或客體、主動或被動，台灣女工是多樣的，從努力打造自我主體性的身份，到他人眼中異文化認同的替代性角色，讓我們在逝去的歷史洪流中，得以更趨近、逼近她們的寫實形貌。女工迥然不同的四個面貌之背後，反身性的書寫真實而歷歷地存在，筆者過往及書寫當時的生命態度，直接地反映、投射到研究對象的女工身上。如前所述，當我在書寫「絕處逢生的移民」、「勤奮打拼的勞工」的台灣女工時，其實，是在書寫過去到現在一直以來的自己，那個不願被輕易打倒、永遠努力不懈、勇往直前的自己。當我在書寫「開拓格局的異鄉客」的台灣女工時，其實，也是在書寫中年焦慮的自己，那個渴望跳脫既有身份、轉進不同軌道、飾演全新角色的自己。最後，當我在書寫「被投射的認同對象」的台灣女工時，也是在書寫那個經常被具有殖民情結的日本人「錯愛」的自己，無須隱瞞也無法隱瞞。

六、反身性書寫的反思

本文的目的是去探照 1960 至 1980 年代八重山群島鳳梨產業「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首先，找出八重山區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報《八重山每日新聞》再現下的台灣女工，然後，透過當地台灣移民對於女工的追憶、沖繩人對於當時女工的回溯、以及女工本人的自我詮釋等各方面的訪談敘事資料，拼湊出 1960-1980 年代台灣女工在島上的可能形貌，整理出她們是「絕處逢生的移民」、「勤奮打拼的勞工」、「開拓格局的異鄉客」、也是「被投射的認同對象」，這些身影的逐一浮現，讓人慢慢跳脫只從報章媒體再現的「替代性的勞動者」、「寄生蟲的高帶原者」這兩種角度去定位她們、捕捉她們。本文昭示及處理的課題是，再現、敘事與反身性三者的關連，筆者在面對《八重山每日新聞》這個文本再現下的台灣女工，以及面對石垣島上相關當事人敘事下的台灣女工時，展開了有意識地反身性應對，並將這個應對運用在本文的書寫風格上。坦白而言，就研究方法上來看，這些受訪者有限的觀察與回想，可能只是片斷而零散的，卻讓我在森羅萬象、複雜流變的歷史潮汐中，擷取到更多樣的女工風貌。這些單次的訪談資料或許只是浮光掠影、捕風捉影，但可以確定的是，對於女工本人、女工周遭的台灣移民、石垣島上的當地人以及研究者的我而言，「移動」這個跨國經驗，確實豐厚了自他的生命內涵，也引領出更寬闊的視野（邱琏雯 2013）。

最後，必須再次對照到先行研究，以定調本文的位置及價值，並針對反身性書寫進行反思。

第一、本文和國永（2011）的先行研究資料有少部分重疊，但即便如此，本文仍有其獨特的視角，因為，本文不只平鋪直述女工在八重山當地的人際關係、具體生活及勞動實況而已，而是要從這些資料中解讀出女工主體性的不同面貌，以及坦承突顯這些主體性的背後，其實和筆者的生命態度息息相關，彰顯研究對象女工的多元身影時，也誠實交待了研究者的我過往和書寫當時的生命態度，研究者及研究對象雙方其實是相互影響、彼此糾結的，研究者的生命態度反映、投射到研究對象的鳳梨女工身上，也表現在問題意識與書寫風格上。本文嘗試的反身性書寫可能略顯生澀，訪談和敘事資料也不夠充分，但卻是筆者非常誠實的告白。

第二、運用反身性書寫的同時，筆者也反思到這種書寫可能帶來的問題。本文使用《八重山每日新聞》與訪談敘事所得到的這兩種資料，拼湊出女工迥然不同的面貌，但本文所拼湊出來的台灣女工之形貌，其實可能哪裡都存在、但也哪裡都不存在。也就是說，我們不難在其他女性（及男性）、女性移民或女性移動者身上找到「替代性的勞動者」、「寄生蟲的高帶原者」、「絕處逢生的移民」、「勤奮打拼的勞工」、「開拓格局的異鄉客」、「被投射的認同對象」這六種似曾相識的身影。因此，也很難斬釘截鐵地論定，「台灣女工」非得是什麼或不是什麼，台灣女工本身就是複數的存在，而且也是流動的、暫時的曇花一現。

日本女性學者北村文（2006、2009）曾提到，當她運用女性主義民族誌（*feminist ethnography*）²⁴標榜的「從女性立場、為女性書寫」的手法試圖描繪她所看到的日本女性時，她發現到，所謂的「日本女性」其實哪裡都存在、但也哪裡都不存在，她們活生生的真實面貌充滿了多義性及多異性，日本女性只是一個概念框框，它和其他概念以及那些概念所指涉的現實之間充滿了落差與分歧。研究者也好、研究對象也好，日本女性本身就是複數的、流動的。她的訪談對象是具有跨國經驗的東京女性以及移住夏威夷的日本女性，研究目的是希望瞭解日本女性身處西方男性為主所建構出來的社會時，在日本人（東方主義之眼）與女性（性別之眼）這種雙重他者（*others*）的被凝視底下，²⁵她們如何承受壓力、如何交涉自他文化的衝突。北村坦承，自己和受訪者之間的關係並非始終如一、平穩和諧，時而合作連帶、分享協助，時而矛盾緊張、甚至背離龜裂，作為日本女性，北村和受訪者有相共與不共的生命經驗，在這樣互動下所得到的研究發現，其實也可能是一時的、乍現的。北村

²⁴ 女性主義民族誌的定義是「研究者以女性主義的觀點，立基於田野調查的經驗和資料，針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描述的過程和方法」（春日キスヨ 1995；中谷文美 2003）。一言以蔽之，就是反省以男性為中心的人類學方法論所描述和研究下的女性處境，強調女性取代了男性。

²⁵ 小川さくえ（2007）也從東方主義與性別雙重他者化的觀點，解構劇作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於1904年創作的歌劇《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之系譜，從1887年至1998年，歷經了Pierre Loti, John Luther Long, David Belasco, Paul Loewen, David Henry Hwang等人的創作與改編，探究西方如何打造出順從、獻身、貞節的「日本女性」之意象。

這樣反身性書寫的告白，確實提供了筆者反思本文的研究發現，六種似曾相識、若有似無的台灣女工身影，雖然多少緣自於筆者的生命經驗，但也不是絕對的永恆的，或許它也無需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它需要的只是研究者的誠實以對，之於自己、也之於台灣女工。

第三、也因此，進行反身性書寫時，必須小心翼翼地面對另一個迷思，那就是：拋開書寫者與被書寫者之間「親密性或共通性」的迷思。川橋範子（1997）指出，女性主義民族誌當中「書寫的女性」與「被書寫的女性」是不同的，兩者間不均衡的權力關係仍然難以超越，民族誌的書寫者與被書寫者之間代言、差異、再現的問題不易解決，書寫者似乎永遠都在榨取、利用被書寫者。因此，必須進一步挑戰並解構書寫者的權威性，突顯書寫者與被書寫者，也就是代言者與被代言者之間不平衡的權力關係，重視眾生喧嘩的多樣性，拋開女性書寫者與被書寫者之間「親密性或共通性」的迷思，學者的特權身份如何不剝奪被研究者的女性她們的主體性與發言權，因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終究難以分享，彼此只是「部份共有」罷了。

如前所述，本文強調研究者的我過往或書寫當時的生命寫照，直接地反映、投射到研究對象的台灣女工身上。筆者可以肯定的是，從受訪者的敘事中挖掘出寶貴的生命經驗，或多或少解決了自己的中年焦慮，但是，我無法確定這些受訪者從我身上，或更精確地說，從訪談敘事的過程中，到底有什麼具體收穫？對他們而言，可能只是打開了塵封已久的回憶，只是經歷了一次不錯的心情分享，如此而已。訪談結束的隔天，仲里主動邀約我和同行的女博士生一同出遊，由她開車兜風讓我們環石垣島見識看看，也請我們到她位於海邊的美麗家屋欣賞風景，觀看甜蜜的家族照片。宮良也是在訪談結束的當下，就力邀我們由他開車環島一周，參訪他的老人安養事業園區，請我們在日航大飯店共進午餐。經過多年來的海外調查經驗，筆者慢慢地知道，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部份共有」的底線何在，希望我能準確拿捏沒有遺憾，更重要的是，當運用到反身性書寫時，也能更加冷靜理性、誠實地觀待自我，以及觀待不遺餘力協助我的研究對象們。

參考文獻

• 中文

- Lieblich, Amia, Rivka Tuval-Mashiach, & Tamar Zilber。2008。《敘事研究：閱讀、詮釋與分析》(*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吳芝儀譯) 。嘉義市：濤石文化。
- 吳麗珠、黃彥芳、楊靖慧。2009。〈2001-2007 年外籍勞工健康檢查概況〉。《疫情報導》，25 (7) : 486-504。
- 松田良孝。2012。《八重山的台灣人》(邱淑雯譯) 。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 林佳儀。2008。《媒體素養教育之教學指引架構發展：以「轉化媒介再現刻板印象」為例》。政治大學廣播與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淑雯。2011a。〈離返與性別規範：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的台灣女工〉。《思與言》，49 (3) : 167-218。
- _____。2011b。〈1960-1970 年代沖繩諸島台灣女工的多元身影：東方主義的再思考〉。《亞太研究論壇》，54 : 61-94。
- _____。2013。《出外：台日跨國女性的離返經驗》。台北：聯經。
-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麗文文化。
- 國永美智子。2011。《戰後八重山的鳳梨產業與臺灣「女工」》。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
- 張錦華。1994。《媒介文化、意識型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台北：正中。
- 章門煌、林玲媛、徐慧貞。2007。〈外籍勞工寄生蟲感染的調查〉。《北市醫學雜誌》，4 (9) : 808-813。
- 黃厚銘。1999。〈知識份子、社會學家、與反身性〉。《台大社會學刊》，27 : 41-70
- 劉紹華。2010。〈導讀：女性主義人類學者的情緒書寫與書寫情緒〉。《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頁 iv-x。台北：群學。
- 露思·貝哈 (Behar, Ruth)。2010。《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黃珮玲、黃恩霖譯) 。台北：群學。

・ 日 文

- 石垣市。2011。〈石垣市の人口（住民基本台帳人口移動詳細表）：2011年 1 月〉。http://www.city.ishigaki.okinawa.jp/home/jinkou/index.htm（2011 年 5 月 14 日閲覧）
- 入嵩西正治編。1993。《八重山糖業史》。那覇：ニライ。
- 小川さくえ。2007。《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蝶々夫人」の系譜》。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 春日キスヨ。1995。〈フェミニストエスノグラフの方法〉。《ジェンダーの社会学》（岩波講座現代社会学 11），頁 169-187。東京：岩波書店。
- 金戸幸子。2007。〈1930 年前後の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る〉。《移民研究》，3：1-26。
- 。2008。〈1930 年代以降の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八重山女性の職業移動を通じた主体形成を促したプル要因との関連を中心に〉。《ジェンダー研究》，11：171-195。
- 。2010。〈「境界」から捉える植民地台湾の女性労働とエスニック関係：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と「女中」労働との関連から〉。《歴史評論》，722：19-33。
- 川橋範子。1997。〈フェミニストエスノグラフィーの限界と可能性：女による女についての女のための民族誌？〉。《社会学年報》，23：55-85。
- 北村文。2009。《日本女性はどこにいるのか：イメージ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政治》。東京：勁草書房。
- 。2006。〈女が女を語る時、女が女に語る時：フェミニスト・エスノグラフィーの（不）可能性〉。《ジェンダー研究》，9：3-26。
- 中谷文美。2003。〈人類学のジェンダー研究とフェミニズム〉。《民族学研究》，68（3）：372-393。
- 那谷敏郎、栗原達男。1969。〈石垣島の台湾人労働者〉。《朝日ジャーナル》，11（34）：81-87。

- 又吉盛清。1990。〈沖縄女性と台湾植民地支配〉。《沖縄文化研究》，16：329-352。
- 松田良孝。2004。《八重山の台湾人》。石垣市：南山舎。
- 。2010。《台湾疎開「琉球難民」の1年11カ月》。石垣市：南山舎。
- 三木健。2010。《八重山合衆国の系譜》。石垣市：南山舎。
- 水田憲志。2003。〈日本植民地下の台北における沖縄出身「女中」〉。《史泉》，98：36-55。
- 。2011。〈戦後琉球政府時代の石垣島における台湾系住民〉。日本台湾学会第13回学術大会，早稲田大学，5月28-29日。
- 目取真俊。2003。〈魚群記〉。《平和通りと名付けられた街を歩いて：目取真俊初期短編集》，頁7-31。東京：影書房。
- 林発。1984。《沖縄パイン産業史》。石垣市：沖縄パイン産業史刊行会。
- 読売新聞広告ガイド。2014。〈販売部数 都道府県別上位3紙〉。
<http://adv.yomiuri.co.jp/yomiuri/busu/busu09.html>（2014年5月23日閲覧）

“Taiwanese Female Emigrant Workers” of Canned Pineapple Industry in the Yaeyama Islands from 1960 to 1980: Representation, Narrative, and Reflexivity

Shwu-Wen Chio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Business,
Nanhua University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capture two aspects of Taiwanese emigrant female workers in the Yaeyama Islands, an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of representation, narrative and reflexivity. The aspects include: to transfer the images of the female workers by local media at that time; and to make a confession of my past and present attitude to life at the time of writing. Consequently, it will reflect not only on the subjects, but also the awareness of the issues and the writing style.

My research found that Yaeyama Mainichi Shimbun considered Taiwanese female emigrant workers to be substitute laborers and parasitic disease-carriers. However, I was able to piece together the would-be images of them based on the reminiscences of local Taiwanese emigrants and the Okinawa islanders, and the narrative of these female emigrant workers. I concluded that the female workers were crisis-survival emigrants, hard-working laborers, pioneering outsiders and identified subjects of the local peoples, a totally different image from that of local media.

Key words: Yaeyama islands, canned pineapple industry, Taiwanese female emigrant worker, Yaeyama Mainichi Shimbun, reflexivity